

“大三巴”、“洋觀音”及其它

澳門文化及“申遺”隨想

鮑志成*

癸未秋，我應邀去澳門參加學術會議，得以再次目睹其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蓮花聖地芳姿。11月5日，沐浴着午後的秋陽，於澳門空港或閒步或靜坐，感懷不已，援筆記之，為作〈再別澳門〉詩一首——

再次檢閱你的滄桑容顏
我不忍心把辛酸的往事訴說
你那浮華的頭戴
莫非是上蒼鑲錯的寶珠
她那血色的光輝
映射出人性的貪婪與慨慷

再次親近你的江海心跳
我看不清自心的天地背影
你那流麗的秋波
莫非是歲月釀就的苦鴉
她那醉人的芬芳
滌蕩着千古的迷戀與情殤

再次目睹你的燈火闌珊
我摸不着此岸的天宇邊緣
你那深沉的霓裳
莫非是塵世編織的偽裝
她那斑駁的顏彩
包裹了滿目的醜陋與肮髒

再次品嚐你的海風星光
我走不出孤寂的天國華堂
你那無垠的額頭
莫非是愚鈍開啟的心傷
她那憂戚的淚痕
表白了無盡的快意與春荒

再次作別你的門楣客堂
我帶不走片片的風水雲霞
你那高貴的氣質
莫非是被溫情磨礪的剛強
她那冷峻的眉角
標榜出當下的無奈與惆悵

再次作揖你的晨曦夕照
我忘不了縷縷的聖歌梵唱
你那神秘的眼神
莫非是明心見性的墳場
她那荒涼的古堡
詮釋着前世來生的彷徨與方向

再次吻別你的紅酥胸膛
我感觸到款款的流連難將
你那多情的衣袂
莫非是牽腸掛肚的停當
她那燦爛的午夜
溫存了三生往還的短暫與悠長

* 鮑志成，浙江省博物館研究員、信息中心主任、《東方博物》雜誌執行主編。



中秋之夜（攝影作品 61 x 51 cm）〔澳門〕陳光忠・2003 年

大三巴和洋觀音

兩次澳門之行，幾乎把彈丸之地澳門的名勝古蹟遊歷殆遍，有的景點甚至重遊，其中最讓我感慨至深的，就是“大三巴”和“洋觀音”了。

“大三巴”其實祇是聖保祿教堂遺留下來的一垛立面牆體。我目睹它以前早就在報刊電視等媒體上認識了它，但對其滄桑歷史及其作為澳門文化地標的內涵，還得等二遊澳門才真正體悟到的。1594年，耶穌會士開始發起籌建聖保祿教堂，1602年奠基，1637年落成。在澳門現存的天主教堂中，它的建造年代最早，也最為著名。建成之初，它在華南一帶非常著名，許多外國傳教士都來這裡研修教義，學習中國文化，同時把西方文化帶到東方來。如意大利教士利瑪竇、德國教士湯若望就在這裡研修中國文化。明代科學家徐光啟也曾在此研習過天主教義。可惜後來屢焚屢建，1835年1月26日又被一場大火焚燬，祇剩教堂前壁，因形似中國的牌坊而被當地人稱為大三巴牌坊，成為澳門地標。澳門八景之一的“三巴聖蹟”即指此。

聖保祿教堂在歐洲巴羅克式建築中融入了東方建築的某些特點。現存的大三巴牌坊共分五層，從上到下都鑲嵌或雕刻着形態迥異籠罩着濃厚基督教色彩的藝術群像。底層是教堂的三面大門，正門和兩個旁門頂上分別用拉丁文刻着“天主聖母”和“耶穌”的字樣；第二層壁龕中雕刻着耶穌會聖人像；第三層正中有一童貞聖母雕像，數名天使和兩種花朵環繞兩旁，其中牡丹花象徵中國，菊花象徵日本，左方石柱上刻有代表生命之樹及聖母征服魔鬼及刺穿耶穌的刑具，以象徵戰勝死亡；第四層有一耶穌聖嬰雕像，其旁刻有用以釘死耶穌的工具；第五層刻有一個代表聖神的鴿形銅像，旁邊圍有代表太陽、月亮、星辰的石刻；牌坊最頂端有一十字架。牌坊前有六十八級石階。整座牌坊的雕刻和鑲嵌工藝非常精細，融合了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精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藝術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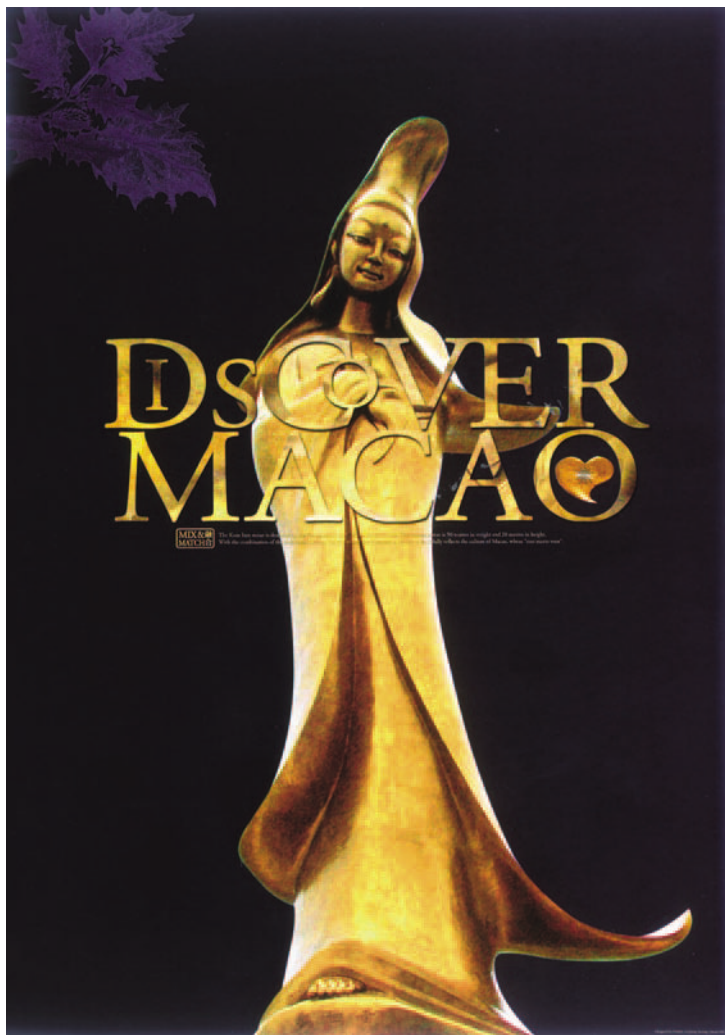
從17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澳門的歐式建築開始局部採用東方建築元素。大三巴牌坊上用牡丹圖

案象徵中國、用菊花圖案象徵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澳門當時已成為遠東地區天主教傳播中心，這種在歐式宗教建築中加入東方象徵性符號的現象，是兩種文化接觸在宗教建築上的反映，雖然祇是“點綴式”的，但畢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開步，其文化上的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到了19世紀下半葉澳門結束混合管治階段後，出現了較多的中西合璧建築，主要集中在民居私宅。當地華人或外來華人開始在私宅建築中採用許多歐式建築風格，在門頭飾、窗頭飾上採用券頂或三角型頂，如鄭家大屋。葡人也在歐式建築中採用中式庭院佈局，或單體中西建築共存一院，如南灣大宅。這一時期可稱為“合流式”階段。

如果說大三巴是澳門東西方文化合璧於宗教建築上之始，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還有頗值得一提的，就是“洋羅漢”和“望海觀音”了。洋羅漢是普濟禪院耐人尋味的特殊塑像。普濟禪院是澳門著名禪院之一，俗稱“觀音堂”，因院內供奉觀音菩薩得名，創建於明末天啟年間，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上曾十多次重修，是澳門古蹟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最具特色的廟宇，也是中國南方少數至今保存較好的禪宗寺院之一。普濟禪院為三進式建築，首座為大雄寶殿，二進為長壽佛殿，三進為觀音殿。觀音殿內的十八羅漢之中有一尊鼻高眼凹、鬚髮鬢曲的洋羅漢，傳說是為了紀念意大利馬可·波羅來華學習禪理而塑造的。大雄寶殿的東西兩側有天后殿、地藏殿、關帝殿、藏經樓等建築，東側有一花園，廣植花草，茂林修竹，清蔭幽寂。整個廟宇庭院廣闊，巍峨壯觀，古樸典雅，構築精美，香火旺盛，是港澳罕見的佛寺建築群，寺院氣氛相當濃鬱。澳門八景之一的“普濟尋幽”指的就是這裡。無論從建築風格還是祀奉的神祇看，普濟禪寺都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式佛教寺廟，它供奉的觀音菩薩是佛教在中國最具大眾化的信仰，尤其在民間有着廣泛的社會基礎。但它同樣是一個兼具其它宗教和民間信仰的混合體，不僅有觀音，也有關公和天后，甚至還有傳說的洋羅漢馬可·波羅。

而所謂“望海觀音”，其實就是聖母像。它位於西望洋山頂的西望洋聖母堂。這裡在17世紀初



發現·融合 [澳門] 李澄暉設計，2004 年

就建立炮臺以抵禦荷蘭人進犯；後炮臺被廢棄，於 1622 年在炮臺原址建造了供奉聖母瑪利亞的聖母堂，至 1935 年進行大規模改建重修。教堂的建築主體為高聳的門樓，屋頂有聖母全身塑像，正門上方有一回狀彩窗。門樓右側是一座頂為錐體的鐘樓，左側是三層帶拱門內走廊的主教府。聖堂門前是一個平臺。在教堂臨崖處有一高臺，供奉着一尊用大理石雕成的聖母全身立像。聖母雙手合十，眺望大海，面容慈祥，被當地華人稱為“望海觀音”。

在中國傳統佛教寺廟和西方教堂裡出現這樣的像設，從宗教文化角度看，是極罕見的個案，

而且它們在形式上是移花接木的，至多祇能算是宗教文化上的“華洋共處”。真正讓我感到澳門文化“中西合璧”的，是澳門回歸前夕建造的“洋觀音”。顯然，洋觀音像是中國的佛教造像，但她融合了歐式的（具體說就是聖母造型的）許多風格和元素，從而給人以中西合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渾然一體的特殊韻味。在澳門回歸的時候，中西文化在這裡接觸交流了四個半世紀之後，在中西宗教建築堅守各自的精神堡壘如此漫長的歲月之後，居然出現“洋觀音”這樣的中西合璧的近乎完美的經典宗教造像，這在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吾輩看來，不僅是十分有意思的，而且也是頗具文化學意義和美學價值的。這種聖母化的觀音造型和藝術風格及其宗教韻味，正是澳門文化特具的。因此，這不能不說是中西文化在澳門交流四百多年的碩果，也可以說它是以天主教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與以佛教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在宗教造像上交融合璧的象徵之作。

“我知道 Macau ……”

從大三巴上的牡丹、菊花圖案，到洋羅漢、望海觀音，再到聖母化的洋觀音，這些宗教建築和像設的演變，揭示了東西文化在澳門接觸、交流、融合的軌跡。這不能不說是由澳門這樣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背景造成的。甚至可以說，廣收博取兼容並蓄就是澳門的文化性格和內在氣質。

從時間上看，中西文化在澳門從相遇接觸到交融合璧，已經經歷了四個半世紀。作為兩種異質文化在相互接觸交流的漫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碰撞、衝突，最後在相互理解中達致彼此尊重，在矛盾鬥爭中求同而存異，在摩蕩互動中逐漸磨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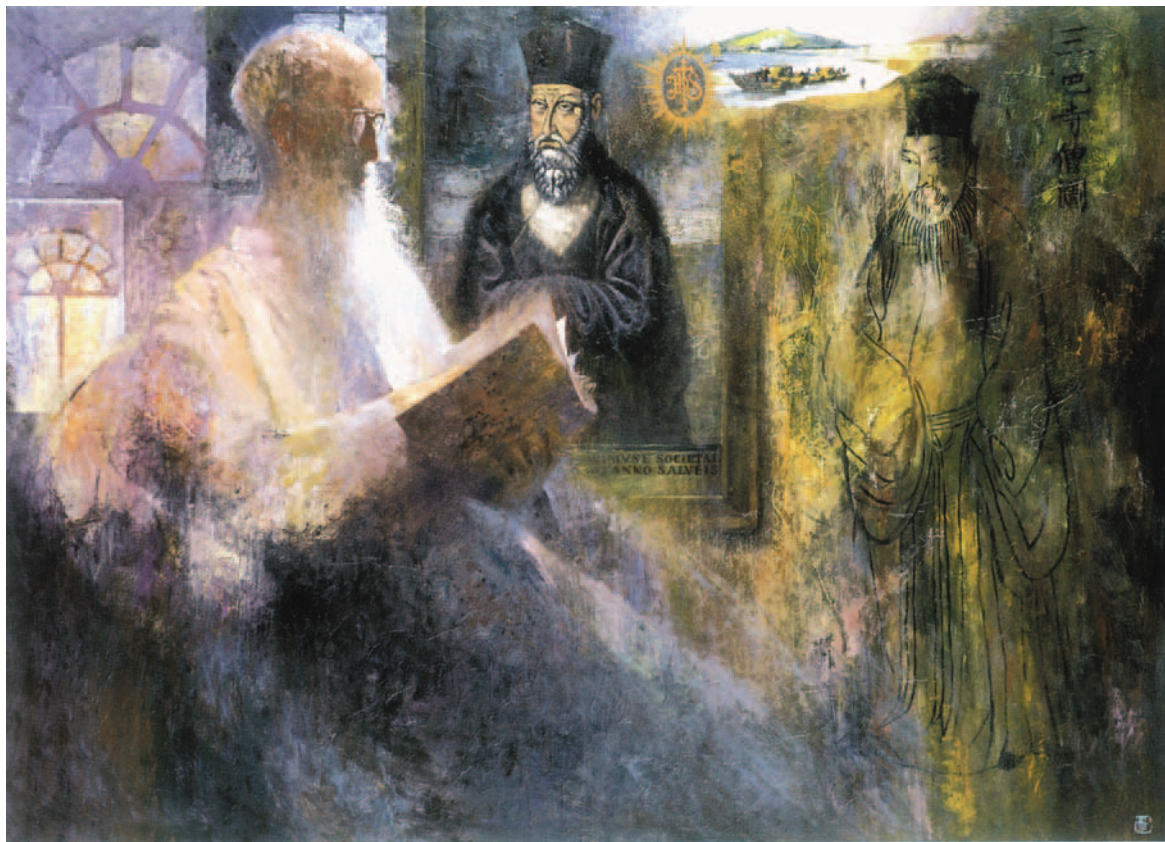
共同發展，最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這是世界上任何兩種文化相遇時都必然經歷的過程。在中國五千年的發展歷史中，印度的佛教文化，從秦漢時傳入到唐宋時中國化，完成交流融合的過程，經歷了近千年的時間。阿拉伯的伊斯蘭教文化，從唐初傳入中國，到元代後期回回民族形成，經歷了約八個世紀。澳門從16世紀中葉起就成為海上之路的重要驛站、遠東最早的傳教中心、東西方文化雙向交流的最早基地。季羨林先生曾說：“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明末清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從明末清初開始的西方文化通過澳門傳入中國以來，已歷四個半世紀。可以說，從全局看，這一過程到現在還沒有最終完成。而澳門作為這一輪中西文化交流的首站，其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也仍在繼續進行中，但相對於別處而言，這裡的機會更多，交融的程度更充份、更深入。在文化交流中，作為文化精神層面的宗教往往是最“頑固不化”的，交融的進程往往是滯後的。正因為澳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進程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像“洋觀音”這樣的造像才會也祇能在澳門誕生並被人們接受。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基本規律：文化交融總是從外表到內在，從低級到高級，從局部到整體，從軀體到靈魂，最後就是形神兼備而渾然一體。在這方面，歐式教堂表現得謹小慎微，小心翼翼，步履艱難，始終祇是在外表徘徊，沒有進入核心層面。儘管歐式教堂裡可以用中葡兩種語言做彌撒，可以供洋教士來研究中國文化，可以發展大量華人為教徒，可以採用中式建築的某些元素，甚至聖母雕像可以被華人認作“望海觀音”，但從整體上而言，它始終堅守着自己固有的歐式風格和上帝領地。而中式廟宇雖然在外在形式上不為所動，但在代表宗教文化核心的像設和造像上，卻不拘泥於成規，竟敢於因時因事制宜，大膽移植或嫁接西方因素，先有洋羅漢，後見洋觀音。這反映了中國文化的開放性結構和恢弘大氣的精神氣質。尤其是深受海外或外來文化影響較大的嶺南文化，本身具有濃鬱的外向開放

的商業氣質，講求現實需求，功利色彩明顯。惟其如此，澳門的中式廟宇往往把佛、道、媽祖、關公等神像並列一堂，形成特有的宗教文化現象。澳門出現洋羅漢、洋觀音實不足為奇。創作洋觀音的人是一位葡萄牙女雕塑家，這就愈加顯示了澳門歷史文化的親和力和影響力，已達到了中體西用包融於一身的境界了。在澳門回歸文化母體之際容納洋觀音這樣的作品，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包括嶺南文化雍容大度廣收博取的表現。

“我知道Macau，不是我真姓名，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我依然保管着內心的靈魂……”從這首感人至深的詩歌，我們可以體味到中華民族在遭受外來欺凌時內心深處所飽受的屈辱和苦難。但是，如果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來詮釋一下這首歌曲時，我們難道不會覺得，除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愛國熱忱，她不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經受外來的西方文化強行滲入過程中認同本土文化而固守民族精神家園的詠歎和抗爭嗎！？因此，當我們津津樂道澳門中西文化交流時，千萬不要忘卻她曾經帶給我們民族的心靈衝擊和精神創傷以及付出的沉重代價。祇有當我們——中方和葡方都在文化心理上認同、接納對方時，我們才可以說：這種文化的交流是成功的。

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告訴我們，不同地區、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能加速本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祇有雙向溝通、平等互利、彼此尊重的交流，才能達到文明的交流融合，產生新的文明形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條件下，文明的交流往往要經過接觸、衝突到融合的過程。要反對那種通過不文明的方式來進行的弱肉強食式的文明交流。美國學者亨廷頓鼓吹的“文明衝突論”不過是為其文化霸權、強權尋找理論依據而已。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文化是沒有國界的，文化交流對社會進步起着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

當然，從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我們還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文化的移植不是融合，祇是相遇和接觸，祇不過提供了相互交流和瞭解的機會。在澳門建造的一些歐式建築，不是中西合璧，更不是文化交融，而不過是兩種不同文化在一地共處、共



走過歲月（油彩拼貼布本 115 x 160 cm）〔澳門〕廖文暢·2004年

存、共生、共榮。祇有嫁接式的文化交流才是文化交融合璧的開始，其最終結果才是真正的中西合璧。先有移植，後有交流，才可能有交融合璧，嫁接的同時有排異，有分流，有共存。移植是嫁接的先決條件，嫁接是移植的必然結果，而變異或許是從移植到嫁接的最終結果。這既是生物遺傳的普遍規律，也是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這或許就是澳門文化“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真正內涵。

正因為澳門文化具有了這樣一種特質，在當代世界政治多元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資訊網路化的大背景下，澳門文化具有了某種鮮明的象徵意義：東西文化交流的典範，多元文化共存的楷模。在澳門和國家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以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若瑟修院及教堂、崗頂劇院、民政總署大樓、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炮臺和東望洋炮臺（包括聖母雪地殿教堂及燈塔）等二十多處文物為代表的

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世界遺產大會上榮登世界遺產名錄的行列，這就把澳門文化提昇到了全人類共同文化遺產和文明成果的高度。

一面申遺成功的鏡子

從澳門申遺成功，我們聯想到國內廣州、泉州、寧波等“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口城市正在通力申遺的努力。

絲綢之路是一條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通道，正是這條古道，橫貫歐亞大陸，把古老的中國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連接起來，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個概念。學術界廣義的絲綢之路，還包括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西南陸上絲綢之路（又稱蜀身毒道）和東南海上絲綢之路（又稱陶瓷之路）。這三條絲綢之路因西北

陸路絲綢之路而派生或得名，它們共同組成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東西方文明交流海陸大動脈。

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文化政策大會”上提出關於世界文化發展十年活動議案，其中有“絲綢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綜合研究一項。1989年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開會確定：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指由希臘雅典至土耳其伊茲密爾、意大利威尼斯，越過地中海至埃及亞歷山大港、蘇伊士港，經紅海南下至阿曼馬斯喀特、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莫爾穆港、斯里蘭卡可倫坡，北上至印度馬德拉斯，轉向東航，來到泰國普吉、印尼泗水、汶萊，再北上泰國曼谷至越南胡志明市，轉向東北航，來到中國廣州、泉州、寧波，前往韓國釜山，到達日本大阪的海上航線。同時，這條航路有若干支線通往附近港口及海島。從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來說，UNESCO的絲綢之路的概念更加寬泛，泛指東西方文明交流。聯合國宣導的文明對話，旨在呼籲東西方通過平等對話加強彼此理解和尊重，開展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促進和平發展，實現共同繁榮。

UNESCO在1989年確立海上絲綢之路概念後，多次組織學術考察。1990-1991年，發起“海上絲綢之路考察”，歷經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及菲律賓諸國，歷時四個月舉辦十餘次國際討論會。1991年又發起“草原絲綢之路考察”，歷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及哈薩克斯坦等中亞五國，歷時兩個月，在烏茲別克斯坦及哈薩克斯坦舉行多次國際討論會。1992年，與蒙古政府發起“遊牧／阿勒泰絲綢之路考察”，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召開國際學術討論會。2003年8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派出考察組對“絲綢之路”中國段進行考察，研究有關“絲綢之路”作為文化通道申報世界遺產的可行性。該考察組已經建議世界遺產中心設立“絲綢之路”提名促進團作為協調機構以推動相關的研究和申遺準備。

中國希望將“絲綢之路”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因為它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遺產多樣性的要求。中國政府目前正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遺產中心與中亞等國家和地區磋商，探討合作，擬將“絲綢之路”專案申報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在我國境內，凡是能證明與“絲綢之路”有着重要關係的歷史文化遺蹟都可能被納入這一項目之中，其中包括“陸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樣既可保證申報項目的優勢，又不佔用國家的名額。

“絲綢之路”最快有望於2007年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討論，且成為中國首個與他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的專案。2004年6月28日至7月3日，“絲綢之路”古遺址保護會議在敦煌莫高窟舉行。2004年7月6日，正在蘇州出席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的中國國家文物局有關領導透露，中國政府有意和日本以及中亞各國一起將“絲綢之路”提名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因此“絲綢之路”有望成為中國首個與其它國家聯合申報世界遺產的項目。

我國目前申報“海上絲綢之路”的城市有三個：廣州、泉州和寧波。此前，福建泉州也有意聯合其它國家跨國申報“海上絲綢之路”為世界遺產。國家文物局準備將“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捆綁整合成“絲綢之路”總項目，作為跨國項目進行申報後，泉州原來的申報文本名為“絲綢之路：中國泉州史跡”，現更名為“海上絲綢之路東端——泉州”，申報時間也在調整。廣州則加大力度，頻頻出招，召開“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港”的學術研討會，就廣州在“海上絲路”各個時期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申報世界遺產等問題，進行研究、論證；甚至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廣州文化日”上，發表“廣州——海上絲路發祥地”的演講，廣州市有關部門捷足先登，將一份精心準備的文本《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親自遞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負責人手中。寧波的申遺工作雖然起步相對較遲，但受到市領導的高度重視，組織健全，工作有力，成效明顯，尤其是在組織海外尋珍、舉辦專題展覽、編印圖書資料和開展群眾性市民活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學術研究和文物保護也取得相當成果。一場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熱正在掀起，同時有關誰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或發祥地的爭論，也在全國冒起。



議事亭前地（水彩畫）

（澳門）鳳子·1980年

如果從 UNESCO 強調絲綢之路對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和進步中的作用這一角度來審視申遺工作，那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兩點啟示：

一是澳門的歷史文化遺產可以納入到絲綢之路這個大項目裡去。無論絲綢之路的歷史地理概念還是澳門文化的特質以及 UNESCO 宣導的東西文明平等對話的現實需求，澳門歷史文化都是完全融合的。大家知道，陸路絲綢之路的莫高窟早在 1987 年已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那麼，澳門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率先列入的項目了。祇是世界遺產中心為何沒有把它們列入到這個大項目中去呢？如果說莫高窟當初還沒有絲綢之路申遺，那麼，澳門申遺時絲綢之路申遺已經如火如荼了。這是否是有關部門有失考慮的一個不周之選呢？

二是各地申遺可參照澳門的成功經驗。在當前這樣一種申遺背景下，要以學術界傳統的絲綢之路時空範圍為基礎，以東西方文明交流為主軸，以中

外文化交流為視野，扎扎實實地做好基本學術研究和文物古蹟的保護工作。要兼顧歷史文化遺產申遺的客觀實際，以世界遺產章程和申遺規程為參照，審時度勢開展申遺工作。不能祇從本地出發，片面強調、誇大本地的地位和作用，自封為發祥地或始發港。不要有僥倖心理，祇想捷足先登，甚至排擠其它地方。在申遺規劃上，要全國一盤棋，統籌安排，爭取成熟一個，申報一個，成功一個。客觀地說，按照國家文物局確定的海陸捆綁申報和中外聯合申報的既定方針，絲路申遺決非是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全民的事，乃至跨國普世的事。祇要尊重歷史事實，工作得法，都是有申報成功的機會的。

由此我想多說一句：澳門是值得我們這些投身文化工作的人一遊再遊的。當你到了澳門獨個兒串街走巷邊看邊想的時際，你可能成了一位嚴肅的歷史觀察家，或者不知不覺地又進入了詩人的角色。